

园区观察

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

妥善应对当地市场变化 招商看重新兴产业

■ 本报记者 张凡

国西电集团、中国蒙牛集团、中海油服印尼公司等。

据了解，合作区总体规划面积约503公顷，共分两期建设。其中，合作区一期位于“绿壤国际工业中心(GIIC)”内，规划面积205公顷，已完成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建设，并投产运营多年；二期项目为完全自主建设的园区，与一期项目毗邻，规划面积约298公顷。

在产业定位上，一期与二期也有一些配套的社会层面的基础设施条件，比如教育、医疗等。合作区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市东部的贝卡西县境内，交通非常便利，距离雅加达市37公里，距离苏加诺国际机场65公里，距离雅加达国际港口——丹戎不碌港50公里，距离万隆128公里，从雅万高速37公里处可进入园区，而且正在建设的雅万高铁在合作区附近设有站点。值得一提的是，合作区所处的雅加达—万隆经济发展走廊，聚集了众多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企业，如上汽通用五菱、本田、三菱、HANKO轮胎、海尔等，产业聚集效应明显。

二是入园企业的企业质量高且多元化。境外经贸合作区能吸引在特定的产业链里具有较强引领力和影响力的企业，这些企业生产效率高、创新能力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同时入驻企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国别上形成多元化。入驻合作区的代表性企业有新西兰恒天然乳制品印尼公司(世界最大乳制品出口企业)、法国斯伦贝谢公司(世界500强)、日本山崎面包株式会社(日本最大面包生产企业)、中

直接导致地区出现数次民众游行，要求政府提高基础薪资。

这也给合作区招商运营带来了不少困难。为此，合作区多措并举：首先，通过线上方式招商拓展客户，构建数字化平台，通过全方位线上数字化营销进行客户拓展，为园区下一步招商工作奠定基础；其次，构建园区智慧化的管理体系，通过线上协同办公、启用银行账单付款方式，提升园区运营管理能力；最后，面对印尼营商环境的变化，合作区提高认识，加强对风险的识别，增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协调，及时获取准确的信息，完善和不断调整应急响应措施，进一步提高合作区的对抗风险能力。

合作区作为广西唯一一个通过国家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在克服合作区自身困难的情况下，也为抗击疫情和支持园区企业运营生产做了许多工作，维持园区正常运转，支持园区企业渡过难关。合作区采用延期申请付款、减免企业一部分滞纳金等措施，缓解相关企业的资金困难；做好合作区疫情防控工作，加强与所在社区的沟通联系，及时增信释疑，为合作区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氛围；在实施大规模社会活动限制期间，合作区在保护园区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继续生产运营，使员工能够在工作岗位继续生产创造价值，这对稳定当地百姓就业和维护所在社区安定，也发挥出一定的社会效益。

与此同时，合作区还发现，疫情催生了新的经济模式和新业态，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不断发展，以电商为代表的新经济也进一步深入人心。这意味着，大众消费观

念将会变化，医疗健康产业或将得到新发展空间。为此，合作区未来发展将紧跟当时产业发展趋势，迎合印尼国内电子商务市场发展需求，积极发展现代仓储物流和跨境电商产业，将招商重点放在现代仓储物流、生物医药科技、跨境电商产业、电子通信等产业。因此，二期项目产业布局旨在实现由1.0向2.0工业模式的产业升级，在一期项目产业布局的基础上，提升产业规模与产业质量。

合作区分析今后局势认为，一方面合作区要精准把握或对接目标产业布局、转移趋势，顺势而为，吸引符合园区产业升级方向的龙头企业入驻，进而围绕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链条，最终实现主导产业的升级，带动园区周边经济发展，打造智能化、高效率管理的园区。另一方面，机遇与挑战并存，疫情蔓延造成的一系列影响对园区管理能力、防疫能力以及招商引资能力都提出了挑战，园区经营压力也随之增加。

在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已经初见规模和成效的当下，为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又好又快发展，合作区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政府、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应建立健全政府合作机制，加强两国沟通与交流，科学制定合作区规划，明确发展目标、产业定位等，为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供指导；二是加强园区之间的经验交流，互相借鉴其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强园区的产业配套服务，提高园区综合实力，为企业“走出去”铺平道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产业转移与升级，从而更好地发挥“一带一路”建设抓手的作用。

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

本报讯 俄罗斯今日经济网站日前发表文章称，中国有可能在2025年前成为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该报道称，2021年，中国大陆奢侈品销售额在全球奢侈品市场上的份额超过了20%。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趋势将在未来几年内继续保持，并令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大量免税商店在海南岛的开业正成为相关增长的主要动力。

“投资开放”经纪公司全球研究部首席分析师安德烈·科切特科夫说，过去40年来，中国通过帮助大量人口脱贫致富，从极度贫困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他认为，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越小，该国的奢侈品销量就越大，因为民众不仅会把钱花在日常生活上，还会购买昂贵商品以提升自身形象。

“在摆脱贫困的过程中，中国正变得类似于一个发达市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得越好，奢侈品消费阶层就变得越大。”科切特科夫说，中国不仅具备足够的增长潜力，还拥有增长所必需的各种资源。从刺激经济的角度看，中国目前拥有远超其他国家的能力。

报道还称，世界奢侈品市场正在逐渐复苏。专家认为，这一市场今年将恢复至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水平，而中国和美国将成为奢侈品市场复苏最快的国家。中国政府推行的支持免税贸易的政策可能令其奢侈品销量在2025年前增加3倍。

(宗赫)

小米将在阿根廷投资设厂

本报讯 据阿根廷《第十二页报》网站日前报道，中国的小米公司将开始在阿根廷火地岛地区生产其智能手机产品，这意味着该公司将在阿根廷进行巨额投资。

在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访问俄罗斯、中国和巴巴多斯期间，阿根廷官方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报道称，尽管小米公司的公告将在未来60天内发布，但一名陪同费尔南德斯总统出访的随行人员透露，小米登陆火地岛“已经成为事实”。

报道称，这家中国公司几年前进入阿根廷市场。但在此之前，该公司一直没有在阿根廷设厂生产的计划。

报道介绍，在登陆计划中，该公司的目标是销售其首批价格低于8万阿根廷比索(约合4820元人民币)的中高端智能手机。

“消费者总是想要替代性的产品，他们将小米视为一个能够为他们提供替代性产品的品牌。该公司很重视在阿根廷拥有的真正增长和发展潜力。”Etercor公司的胡安·巴勃罗·巴亚尔迪说。Etercor公司被小米公司选为在阿根廷的授权经销商。

报道还称，在获悉的设厂消息得到确认后，预计小米手机将开始由Etercor公司在阿根廷境内生产。Etercor公司在火地岛设有工厂，并拥有生产最新一代手机产品所需的工业设备。

据报道，这家阿根廷公司目前拥有400名员工。该公司还将承担小米产品在阿根廷的售后服务，就像它与Bose、诺基亚和苹果等品牌的合作一样。

(毛雯)

投资环境

巴西去年服务业产值
增长创历史最高

据中新社报道，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巴西服务业产值较2020年增长10.9%，创下该国2012年开始该项统计以来最高纪录。2021年，巴西受调查的5大类服务行业均出现增长。其中，家庭服务产值涨幅最高，增长18.2%。其次是交通运输与辅助性服务以及邮电业产值增长15.1%，信息与通信服务产值增长9.4%，专业、管理与配套服务产值增长7.3%。专家分析说，巴西服务业产值占该国GDP比重70%以上，2021年，巴西服务业产值表现不俗的原因主要是疫情期间，信息技术、仓储、物流和辅助金融等服务得到较好发展。

法国将推出能源生产新项目

据新华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宣布，法国将在能源生产领域大规模推出新项目，加快可再生能源建设，并重启民用核电站建设。根据该计划，到2050年，法国将建成50个海上风力发电场，实现风电产能达40吉瓦的目标；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00吉瓦以上；将建成6座新一代EPR2核反应堆，实现核电发电能力增加25吉瓦的目标。法国《世界报》报道，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法国能源消耗总量的19.1%，低于欧盟提出的23%的目标，法国是欧盟国家中唯一未达标的。

日本敲定半导体产业扶植细则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日前制定了扶植半导体产业的具体政策。日本政府开出的条件包括，在获得补贴后，工厂最少需要连续生产十年才可以退出。如果在较短时间内结束生产，工厂将会被取消认证资格，并要求退还补贴。而且日本政府还要求企业在半导体供需紧张之时增产，不得向海外转移技术。日本政府也加大了相关产业人才培养力度，计划从熊本开始，陆续在福冈和鹿儿岛等九州地区6个县的高等专科学校，开设教授半导体技术的课程。(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虎年春节假期之后，位于重庆的中国石化川维化工生产一线一派繁忙。该企业生产的PVA(聚乙烯醇)等精细化工产品整装待发，将通过中欧班列发往欧洲。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我国急需适应全球税务环境新变化

■ 程亚文

国家根本，这个问题在新世纪以来因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已被进一步凸显。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曾分析过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发生演变，提出欧洲国家普遍经历过在强制手段和资本的两方面积累，以此建构战争机器，实现领土的扩张和巩固，在此过程中，国家的预算、税收和债务都大规模增长。19世纪以来的美国同样如此。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建立在扩大税收的基础上。为支持美国在二战中的财政支出，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一度高达50%以上，直到上世纪60年代保罗·肯尼迪当政期间仍维持在这一水平。2018年，在特朗普政府推动下，美国将原本35%的企业所得税累进税率调整为21%的单一税率，很多美国企业已经习惯在较低的税率下运行，它们不愿提起、人们也已普遍忘记的是，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企业税率仍高达45%以上。

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大部分国家的企业税率都在下降，在进入21世纪后的10年间，下降幅度更为显著。数据

显示，1980年全球企业所得税率的简单平均值为38.84%，到了2018年已为23.03%，下降幅度为41%。在2000年前，只有42%的管辖区将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降至30%以下；到2010年，已经有77%的管辖区将法定税率降至30%以下。新世纪以来，很多国家的债务规模都在大幅上升，欧洲不少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曾深陷债务危机、引起世界瞩目。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国家税收的减少密切相关，它又有两个重要变化紧密相连：一个是随全球化深入发展而发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冲击原有的征税规则和制度，给精准征税带来很大挑战。就企业税而论，传统上企业税的征税基础是“来源地”，即按照生产活动所在地征收企业税，但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日益细致、产业链的不断延展，商品生产的流程日益复杂，会涉及很多国家和工厂，还涉及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想明确“来源地”已十分困难。要改变“来源地”规则重建合理有效的新规，又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做到的。

另一个是，大型跨国公司利用很多国家的发展主义导向及促进经

济发展的压力，逼迫国家以减税的方式对其让利。近几十年间，一些发展中国家有所发展，个别国家还获得很大发展，这当然值得肯定，但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中，表面看来，的确给一些不发达国家带来可观的经济增长，提升了其就业水平，却是以沉重的社会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跨国公司利用国家竞争的现实，在主权国家间唤起经济发展的危机感，大多数国家都只能为最大限度获得经济发展而相对忽略国民福利。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也不乏见。美国公司以往名义上税率较高，但实际上，不少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型公司，避税或缴税很少的情况普遍存在，而且对其监管的机制也十分松懈。一家美国报章曾这样写道：“主权国家未能发明一种有效的架构来管理遍布全球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肆意展示着自己的贪婪。”

大型科技和金融公司在母国逼迫政府降低税率，在国外享受税收优惠，给很多国家都造成税收流失，从而给它们维持福利制度、开展国家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形成经济生

活全球化与福利保障国别化之间的高度紧张。不仅如此，一些国家还将因缺乏全球管理而带来的税收流失和国家利益受损问题，迁怒于其他国家的“不公平竞争”，从而引发国际关系的紧张。因此，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建议，应成立一个国际机构向富豪征税，一家美国智库2018年也指出允许大型跨国公司逃避重税加剧了不平等并且削弱了公共预算，为此需要开展多边合作和建立新机构比如全球竞争管理局，以有效监管这些企业。

全球化带来的税收、税率失调，以及它给国内治理和国际关系带来的困扰，是新世纪以来才逐渐突出的一种新现象。如何对其进行全球治理，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新问题。全球最低企业税是面对这一问题的一个最新行动，但这一提议的出台，背后有着浓厚的美国自身利益考量，可以预料，这一提议在转化为更多国家共同行动的过程中，一定会充满波折。对刚刚拉开大幕的全球税务纠偏，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